

中共党史 教学批判资料

供内部批判
不得外传

天津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
一九七四年六月

说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要自学，靠自己学。……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错误路线头子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他们的反革命言论是我们的反面教材。为了给学习中共党史提供些反面教材，我们选编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刘少奇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抛出的这些大毒草，供同学们在学习中共党史时批判用。

我们要认真读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批判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这些反面材料，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不要遗失，用后收回。

目 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摘录）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1)
-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摘录）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4)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決議（摘录）
（一九二六年九月） (10)

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決議案（摘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
扩大会議通过） (11)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議通过：目前
政治任务的決議） (19)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 陈紹禹：中国革命底根本問題
（一九三一年二月） (32)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 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39)
- 王明：三月政治局會議的总结（摘录）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繼續抗战和爭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48)

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 刘少奇：时局問題的報告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49)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刘少奇反革命言论摘录 (60)
-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言论辑录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摘录)

陈 独 秀

……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須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沒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沒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沒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沒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国民党應該明白觉悟負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絕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錯誤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作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

动自始便以維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應該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絕對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抓錢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絲毫不負責任的；就是在沒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終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終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調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資妥协”更险恶于“勞資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蠹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勞資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應該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應該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

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絆；（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摘录）

陈 独 秀

.....

（三）

.....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

軍，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貴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資產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鮮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勢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攏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資產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輕視了資產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錯誤觀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資產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資產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資產阶级固不及大資產阶级勢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競爭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資產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沒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資產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別发达，所謂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介在貴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貴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貴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侶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世而论，在坏的方面：議員政客们都属士的阶

级，沒有强大的資產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軍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午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現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漸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識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議決了許多国民革命的議案，并且議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議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識阶级沒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沒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想，这正是知識阶级和純粹資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阶级有时比資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謂“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資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現社会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紳魚肉，这四种环

境却有驅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規模的抗稅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見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 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觀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須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軍，才能够實現此种革命的爭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勢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規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資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須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資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損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資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問題。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大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看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

立的革命勢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为阶级的政治爭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應該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單純经济爭斗，沒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軍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爭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軍阀，所以经济斗争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爭斗。我们更應該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爭斗，只是一般的政治爭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爭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爭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軍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資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須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

（七）

.....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許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視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

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沒有予计的可能，也并沒有予计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无从说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 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摘录）

——一九二六年九月——

.....

（五）对地主民团及地方政府政策

甲、对地主政策，我们的策略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做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紳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紳土豪的口号，事实上打倒大地主。

乙、对民团政策，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紳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現在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組織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用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紳代替劣紳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資产阶级手上，而不为农民运动之障碍。

丙、对地方政府問題，应分别来说：

一、对軍閥统治下的政府，应不断的反抗，或分裂削弱其统治以达到要求；

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地方，应以民众要求的形式取得权利。

.....

（九）武装自卫

甲、农民现实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二点：

一、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

二、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

乙、自卫军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误会和嫉视。

丙、自卫团之组织，不要过于复杂，务取其简单容易行动。

丁、自卫团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发生超出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

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
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摘录）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

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

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获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五（略）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

級是
，月比
采動正
地分發

負起責任來，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不過是奪取革命領導權蒙蔽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手段，領導權到手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立刻便不得不將他轉交給豪紳地主階級，就是完成反革命勢力的復辟，結果是反革命的領導權仍舊在豪紳地主階級手里，而不在資產階級手里。如汪精衛等類的政客，想“改良”土地關係（如應允減租百分之廿五等），可是這種政策在幾天之內便完全破綻，單是這一例子便證明改良政策不過是公開的欺騙。再則全世界客觀的形勢是革命的，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又在急進的施行，這種情形也就是使中國沒有由改良主義得着外國資本家的幫助，而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要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兩個條件：（一）使中國完全永久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二）帝國主義战胜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战胜蘇聯。此外中國不能由改良主義的方法去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却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革命雖然受着屢次很大的失敗，而中國勞動民眾革命運動的力量不但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用盡，而且現在剛在重新爆發革命鬥爭的高潮。

最近幾個月的經驗，鐵一般的證明這件事。中國偉大的革命已經喚起如此廣大的工農苦力群眾，他們都起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民眾激憤的革命力量，決非幾個月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所能完全打滅的。

所有這一些情形，都使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這一觀察，並不帶着“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的幻想。中國的客觀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並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中國革命